

1.

我是在一個葬禮上認識他的，在市郊的一座小教堂。那天氣溫很低，但陽光卻非常漂亮，漂亮到讓人覺得死亡或許也不壞。主祭神父跟葬禮的主角(我忘記這位老先生的名)一樣白髮蒼蒼，但因為美麗的陽光先穿過教堂的彩色玻璃再灑上他的銀白髮，金黃色的光芒就這樣彈起來。特別是獻香的時候，神父晃動閃亮的銀香爐，乳香的煙混合著光粉瀰漫到整個空間，在不知道是要往上還是往下飄散的時候就消逝了。老先生已經過世，輔祭男童好年輕，教堂外的天是澄澈的藍，而我和其他人都還在過程裡。

我在彌撒的樂聲中恍惚了起來。

我不知道身為外國人的我臉上到底是出現了什麼樣的表情，但顯然是微微冒犯了他。他跟我說，「妳呀，就像透明的蝦子，讓人一眼就看穿妳在想什麼。」哪有那麼糟，我想。我也不太相信那個蝦子的比喻，他說的是一種很特殊的鹹水蝦，像水晶一般完完全全透明的蝦子。但他出生在一個離海洋非常遙遠的內陸省，在一個連一公厘的海岸線都找不到的城市裡長大，我海島生海港長的人都沒見過了，他又是去哪裡看到那樣的蝦子？

「雖然老先生是不認識的人，但妳一定是沒有受過什麼傷害，才會以那樣的表情參加葬禮。」他盯著我，灰藍色的眼珠透著輕微的譴責。

「“那樣的”表情是哪樣的？」他的話實在很直接，我的用語也不客氣了起來。

但他眼中的譴責馬上就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溫和但又悵然若失的眼神，那是一雙經歷過故事的眼睛，眼珠上有一層分明而且晶醇的水膜，把他想傾吐的情感封住了。「這個人住在玻璃屋裡。」我馬上這樣想。所謂玻璃屋人就是乾淨、孤獨、不讓人碰的那種人。我自己發明的詞。

「算了，反正不重要……」

看吧，他馬上走回自己的玻璃屋去了。

但，除了他覺得不重要的事情(正確的說，是他覺得“對我來說”不重要的事)之外，玻璃屋人倒是滿好聊的，並不是說他是健談的人，而是我們倆的頻率，似乎還滿適合當互相的談話對象。

玻璃屋人叫 Felix，是個大提琴手，稍微熟了之後我都直接用中文叫他黑頭，因為他姓 Schwarzkopf，字面直譯中文的確就是“黑色的頭”。現在中文越來越流行，得到這樣的一個小名他似乎也挺開心。“葬禮上認識的朋友”感覺有點奇怪，但撇開死亡這樣嚴肅的前提，那種場合對我們來說是一點也不稀奇。是的，那是個打工的場合，我們都是為錢去的，為了生活不得不去的。我們因為“死”，也因為“生”而認識。

那時我還是個音樂院學生，而且是好不容易才來到德國。物價好久沒跌過了，

不多打一些工實在不行。黑頭剛從維也納的音樂院畢業回到家鄉，也就是我唸書的城市。他只想在這裡工作，而那陣子附近的樂團全都沒有缺(有缺也得要考得上)。不過還好，這是個音樂活動相當活絡的城市，大大小小的演出總會需要臨時樂手，包括像彌撒、葬禮追悼會之類的特殊場合，酬勞高低不一。我們都是靠這些在支撐生活。不過，這個城市生活費實在高，只靠接演出怎麼說也不能算穩定，日子過得不太輕鬆是一定的。

「你為什麼要跑到維也納去唸書呢？」本地的音樂院也相當有名，完全不輸維也納的學校。

「因為想離開家。」他回答得很簡短。

「……那為什麼又回來？」

「因為女友轉學到這裡來了。」

「她學什麼的？」

「跟妳一樣，小提琴。」

「真的？」那不就是我學校同學了？「她叫什麼？」

「Lena，」他說。「Lena Linz。」黑頭面對著我喃喃吐出女友的名字，但我的臉並沒有聚焦在他的瞳孔中，他的眼光散在我身後。

他說的 Lena 我的確認識，但只是點頭之交。她約一年前轉過來唸高級班，個子不高，長得有點像搖滾歌手 Avril Lavigne，琴拉得不錯，得過幾個小獎，在校外不時有小型的演奏會，算是個亮眼的學生。但我記得今年開學的時候在教務處見到 Lena——一個暑假不見，她腹部隆起，聽說懷了個男孩。

「你是孩子的父親？」

「……不是。」黑頭的語氣像是他在這裡做了個彈性速度的演奏。「她轉學以前我們就已經分手了。」

「噢——」

「對，」黑頭打斷連我都還沒想到該怎麼接的話，「可我還是……總之，我也來這裡了。」

所以不是你的女友嘛，我心裡想，開始覺得這個人有點奇怪。